

中国语言地理

第一辑

Zhongguo Yuyan Dili



萧红 主编

中国 语言 地理

第一
辑

Zhongguo Yuyan Dili



萧红 主编

长江出版传媒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语言地理. 第一辑 / 萧红主编.

—武汉 : 崇文书局, 2017. 3

ISBN 978-7-5403-4322-4

I. ①中…

II. ①萧…

III. ①地理语言学—中国—文集

IV. ①H004.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7780 号

中国语言地理·第一辑

责任编辑 李艳丽 张 弛

责任校对 董 颖

责任印刷 李佳超

装帧设计 徐 慧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 崇文书局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C 座 11 层

电 话 (027)87293001 邮政编码 430070

印 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 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 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调换)

本作品之出版权(含电子版权)、发行权、改编权、翻译权等著作权以及本作品装帧设计的著作权均受我国著作权法及有关国际版权公约保护。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改编、转载、印刷、销售、传播之行为,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法律顾问: 吴建宝律师工作室

编 委 会

主 编：萧 红

编委会：张延成 萧 毅 熊桂芬 阮桂君
郭婷婷 王玥雯 王统尚 陈练文

本著作系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70后”学者学术团队建设计划(第三批)项目成果之一,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序

宗福邦

萧红教授带领武汉大学 70 后创新团队要办一个《中国语言地理》的辑刊，嘱托我给他们的创刊号写几句话，大概是因为我早年曾在这方面写过点儿文章吧。看着这一群朝气蓬勃而富有勇气的年轻人，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了。在国外，特别是日本等国家，语言地理学已经是一门很成熟的学问，拥有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但在国内，却还是一块新开垦的处女地。运用国外已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方言是当代汉语学界的一个热点，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曹志耘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2008 年）等。但是国外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国外语言研究的基础上，符合他们的语言特点。如何在学习、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自己特点的中国语言地理研究理论和方法，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

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想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加强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看清楚汉语的全貌；另一个就是深入开拓汉语方言史研究这个领域，加强对传统文献中的方言资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如《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中就收集了不少历代方音的材料。只有充分利用这些在汉语悠久的历史中保存下来的材料，我们才能对汉语的历史过程有个充分的了解。季刚先生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他对《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的题名有一个精辟的解释：“言绝代者，为时间之异；言别国者，为空间之异；而空间纵之则为时间，时间横之则为空间，故《方言》一书，即解释古语之书也。南北之是非，由方言而可知之；古今之通塞，亦由方言而可知之也。”（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季刚先生还指出：“固知三古遗言，散存方国。考古语者，不能不验之于今；考今语者，不能不原之于古。世之人或徒慕艰深而多书古字，或号称通俗而昧于今言，其皆未为懿也。”（黄侃《蕲春语》）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对汉语做精深的研究，也才能形成自己的语言

地理研究理论和方法。

这一本《语言地理研究》创刊号收录论文 10 余篇，涉及文字、音系、词汇、语法、训诂、方法论等领域，内容多样，而能紧扣语言要素的地理特征，立足翔实语料，且有理论探索，体现出团队的理论勇气和自主创新精神。希望他们继续努力，走出自己的路来。

祝愿《中国语言地理》日久生辉，越办越好。

前 言

2016 年的年初，是梦想起航的日子。我一遍遍地看《中国语言地理》第一辑的目录，百感交集。它不是一本普通的论文集，它代表着我们团队成员集体的心血，承载着团队的学术理想。《中国语言地理》的诞生，需要感谢很多人，有来自学界前辈学者的大力支持，无论是言语鼓励还是惠赐大作，都给了我们莫大的支持，还有武汉大学社科院对 70 后学者团队慷慨的扶持资助，为我们的出版提供了宝贵的资金。崇文书局的李艳丽编辑等不辞劳苦的努力，也为本书的面世提供了直接的帮助。

我们团队从 2010 年开始筹划组成，至 2012 年正式建立。其实更早我们本就是同事、同学、同行和好朋友，身处武汉大学文学院这个有着优秀的学术传统的大环境中，大家年纪相仿，在学术上志同道合，在生活中互相关心，很自然地组成了团队。正如我们申请学校支持时所言：我们这几个人，虽然是后学晚辈，但是有着我们共同的学术理想，希望凭借我们的努力，为汉语语言学研究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团队名称为“面向理论与应用的中古汉语多维研究团队”，在我们为自己提出的研究任务中，既包括分地域的中古汉语语法研究，也有中古汉语语料库建设，还有中古音韵资料汇编，以及现代汉语方言及方言历史源流的研究。加之，我们之前有过关于江汉流域语言文字流变研究的整体研究计划，于是，自然而然地，团队几个板块的研究汇合到语言的地理特点的研究中来。经过大家十数次热烈的讨论，团队最终决定以“中国语言地理”命名我们的队刊，以此承载团队融汇古今的理想，使之成为凝练团队成员研究的共同点和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平台。

语言地理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名称也有很多不同，有“方言地理学”、“地理语言学”等。我们认为的“中国语言地理”的范围比它们更广泛，举凡中国境内语言（以汉语为主）的地域特点，汉语语音、语法、词汇、文字演变中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因素，方言的形成、分布与历史上的移民或地理区划的关系，等等，都在我们所说的“中国语言地理”的范围之内。我们的理想是进一步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将汉语、汉语诸方言、民族语与地理学、人种学等更密切地联系起来，吸纳更多的同好，一起从事更广阔的研究。

第一辑共收录了 14 篇文章。虽然讨论的具体问题各不相同，如其中 11 篇文章涵盖了语音、词汇、语法、文字各层面的演变，不一而足，但又有着共同的主题即地理色彩：比如作者或讨论汉语语言现象的地域特点、地理分布，或探讨方言的变

迁以及语言现象发展演变背后的地理因素，可谓主题鲜明。另有 3 篇文章是影响较大的域外有关语言地理方面成果的节译，蒙作者慨允，登载于此，藉以打开一扇窗户，让更多的人了解域外学者对于语言地理的研究进展，以飨同好。

《中国语言地理》第一辑就像一棵稚嫩的小苗，在语言研究的华苑中初绽新芽，未来的发展如何，尚需经历学界的检验。我们将不懈努力，把它办成一个有思想、有旨趣的学术园地，以文会友，使它成为有着共同学术兴趣的学者们的交流平台，让汉语语言学的发展更为多姿多彩。

萧 红

2016 年 1 月 12 日

于武昌南湖寓所

目 录

“筷子”的词汇地理学研究	项梦冰 /	1
用汉字注释古代方音的基础音系问题	孙玉文 /	34
楚文字基本笔画的地域标志	萧 毅 /	48
韦昭音注反映的三国吴语音系特点	熊桂芬 /	55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释义元语言“地名”论析	李 睿 张延成 /	65
“居(gu)蹲”的语言地理分布及文化阐释	王统尚 /	78
论扬雄《方言》中南楚方言之地位	陈练文 /	97
清代图经志书中新疆地名的通名与专名	杨欣烨 /	107
敦煌文书中人名地域色彩探析	杜文涛 /	119
中古阳声韵摄在汉语方言中韵尾脱落及阳入变化情况	赵清泉 /	124
从罗田方言语法特征看江淮官话黄孝片与赣语的关系	徐 英 /	145
汉语方言地理学——历史、现状与理论课题	岩田礼著 王曹杰译 /	154
语言的地理扩散	Chambers & Peter Trudgill 著 阮桂君 张宇萍节译 /	174
类型学和地理学视角下的汉藏语语序	Matthew S. Dryer 著 朱嫣红节译 /	192

“筷子”的词汇地理学研究^{*}

项梦冰^{**}

一 引言

筷子(chopsticks)是一种起源于中国的进餐用具,多为竹、木所制,也有金属、象牙、骨头、塑料等其他材质的。讨论筷子或涉及筷子的专著和论文已经有很多,例如蓝翔(1993,1999)、刘云(1996,2006)、刘云、朱碇欧(2000)和张成材(1988)、王仁湘(1990)。张成材(1988)曾经期待“如果我们就‘箸’‘筷子’的使用情况对全国县市以上的方言点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便可以绘出一张‘箸’‘筷子’分布的方言地图来”。《汉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2008)的出版使得这一期待变成了现实。本文拟以《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112图“筷子”(下文简称LV112)为依据,从词汇地理学的角度对汉语方言里筷子的说法重新进行梳理。全文共分七节:一、引言;二、LV112的词形分类;三、词形重分类;四、解释性地图;五、筷子的称谓简史;六、地图的初步分析;七、结论。文中所引古籍只在首次出现时交代所据版本。为了行文方便,有时径用“快”(即“筷”)、“箸”代表“快”类词形(“快”及其衍生形式)和“箸”类词形(“箸”及其衍生形式)。

二 LV112 的词形分类

LV112把930个汉语方言点筷子的说法归为4大类36小类,本文转写为表1,两个注是原有的。

^{*} 本研究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区域类型视角下的汉语方言计量性比较研究”的资助(项目批准号2009JJD740002)。在写作第五节“筷子的称谓简史”时,曾就若干问题先后请教同事徐刚教授和邵永海教授,获益良多,谨致谢忱。当然,一切不当概由本人负责。

^{**} 作者简介:项梦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表 1 LV112 的词形分类

	A 类 (黑色) ⁶⁷²	B 类 (红色) ²¹⁴	C 类 (蓝色) ³⁵	D 类 (绿色) ⁹	
1/9	筷子 [538]	箸 [166]	箸码~筷码 [1]	筷箸 [26]	箸子① [1]
2/10	筷儿 [20]	箸~筷子 [5]	箸只 [8]	筷箸~筷子 [3]	花签儿 [1]
3/11	筷一/ [筷一]② [32]	箸~饭箸 [3]	箸双 [2]	筷箸~筷 [1]	花签儿~好杆 [2]
4/12	筷 [68]	箸~糜箸 [3]	双箸 [4]	筷箸~筷双 [1]	好杆 [2]
5/13	筷~筷子 [3]	箸~箸 [1]	骹箸 [1]	筷箸~筷手 [1]	手~筷子 [1]
6/14	筷条 [8]	箸子 [5]	饭箸 [4]	筷箸~箸 [3]	□ [ts ^h ia ₂] 子 [1]
7/15	筷码 [1]	箸子~筷子 [3]	糜箸 [7]		□ [zɔ̌] 子 [1]
8	筷手 [2]	箸头~筷哩 [1]			

三 词形重分类

为了更好地绘制解释性地图, 本文把表 1 的词形重分类如表 2。

表 2 词形重分类

	A 类 (“筷”类) ⁶⁷³	B 类 (“箸”类) ²⁰⁴	C 类 (兼用或混合) ⁴⁵	D 类 (杂类) ⁸
1	筷子 [A1 ⁵³⁸]	箸 [B1 ¹⁶⁶]	筷箸 [C1 ²⁶]	好杆 [D4 ²]
2	筷 [A4 ⁶⁸]	箸只 [B10 ⁸]	箸~筷子 [B2 ³]	花签儿~好杆 [D3 ²]
3	筷一 [A3 ³²]	糜箸 [B15 ⁷]	箸子~筷子 [B7 ³]	花签儿 [D2 ¹]
4	筷儿 [A2 ²⁰]	箸子 [B6 ⁵]	筷箸~箸 [C6 ³]	箸子 [D1 ¹]
5	筷条 [A6 ⁸]	双箸 [B12 ⁴]	筷箸~筷子 [C2 ³]	□ [zɔ̌] 子 [D7 ¹]
6	筷~筷子 [A5 ³]	饭箸 [B14 ⁴]	筷箸~筷 [C3 ¹]	□ [ts ^h ia ₂] 子 [D6 ¹]

①箸:《说文》楚谓竹皮曰箸,从竹若声。

四个大类分别用 ABCD 代表,并括注 LV112 所用符号的颜色。无论大类小类,都按照笔者的点算标出方言点数,容或有少许误差,但不会影响本文的总体结论。A3 的词形“筷一 [筷一]”疑应为“筷一”。

从表 1 可见,以“筷”或“箸”为词根的说法(A、B、C 三类)占了绝对优势,其他说法(D 类)还不到 1%。各大、小类的地理分布情况请参看 LV112 原图。

②不包括“筷子”“筷儿”。

A 类（“筷”类） ⁶⁷³	B 类（“箸”类） ²⁰⁴	C 类（兼用或混合） ⁴⁵	D 类（杂类） ⁸
7 筷手 [A8 ²]	箸~饭箸 [B3 ³]	筷箸~筷双 [C4 ¹]	
8 手~筷子 [D5 ¹]	箸~糜箸 [B4 ³]	筷箸~筷手 [C5 ¹]	
9 筷码 [A7 ¹]	箸双 [B11 ²]	箸头~筷哩 [B8 ¹]	
10	散箸 [B13 ¹]	箸码~筷码 [B9 ¹]	
11	箸~筹 [B5 ¹]		

表 2 仍维持 ABCD 四个大类，每类词形后用方括号注明表 1 的类别及方言点数，并按方言点数降序排列。所做的调整有：①表 1 的 D5（手~筷子）改归 A 类。②表 1 的 B2（箸~筷子）、B7（箸子~筷子）、B8（箸头~筷哩）、B9（箸码~筷码）改归 C 类。C 类词形是 A 类词形跟 B 类词形的兼用（如 C2、C3）或混合（如 C1“筷箸”）。D 实际上是杂类，方言点数很少，不是本文的关注对象。表 2 的 A8、B11 两个小类本来也属于词形兼用的情况，考虑到“手”大概源自“筷手”的省略，所以将“手~筷子”归在 A 类似乎是天经地义的；B11 是“箸”类词形和杂类词形的兼用，因为杂类不是本文的关注对象，所以凡主要词形跟杂类词形的兼用都不单独独立类。D5（□ [z₂ɔ̃] 子）跟 D4（箸子）或为相同来源，因资料不足仍处理为不同的小类。

“筷”类词形的原型为单音节的“筷”，通过附加（筷子、筷儿、筷哩、筷一；筷双、筷条）或复合（筷手、筷码）形成其他词形，“手”大概是“筷手”的省略；“箸”类词形的原型也是单音节的“箸”，通过附加（箸子、箸头；箸双、箸只）或复合（糜箸、饭箸、散箸、双箸；箸码）形成其他词形；“筷箸”则是因说“筷”类词形的方言和说“箸”类词形的方言发生接触而产生的词形混合（参看下文图 2 或图 4）。汉语词汇地理学的研究一再证明方言接触所产生的词形混合是汉语词汇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参看项梦冰 2013，倪志佳、项梦冰 2014）。“一码”类词形或可归为附加式，“一双/只/条”类词形或可归为复合式。

就“筷”、“箸”的兼用和混合而言，还有一种情况是仅就 LV112 无法进行讨论的。即有些方言在指称筷子的情况下只用“筷”类词形，在指称筷笼等其他物品的情况下仍保留“箸”类词形，或是使用混合词形，例如（分别据蔡国璐 1995，99、29、139；卢今元 2007，312；叶祥苓 1988，378）：

丹阳 筷 k^huæ₄筷子 | 箸笼 tsu₁ loŋ₄ 筷笼 | 火箸筷 xə₁ tsu₄ k^huæ₄ 火筷子
吕四 筷 k^huæ₄ 筷子 | 筷箸笼 k^huæ₄ dzu₄ loŋ₄ 筷箸
苏州 筷儿 k^hE₄ 筷子 | 筷儿箸笼 k^huE₄ zɿ₄ loŋ₄ 𩰚𩰚箸笼（“儿”原

记作“五”)

“火箸筷”和“筷箸笼”“筷儿箸笼”大概是“火箸”和“箸笼”在“筷”类词形的影响下产生的混合。这些例子可以说明北部吴语区在普遍接受“筷”类词形之前也是说“箸”的。张成材(1988)对这类兼用和混合曾经有过很好的说明,请参看。

四 解释性地图

根据 LV112 的数据及表 2 的分类绘制的解释性地图如图 1 所示。从图 1 可见: ①“筷”类词形遍布于全国大部分地区, 连续性相当之好; ②“箸”类词形主要分布在浙南、福建、潮汕地区以及台湾、海南, 连续性也相当好; ③“箸”类词形在两广、湘南、湘西、川东、冀中亦有大小不等的局部连续分布区或散点分布, 而“筷”、“箸”类词形的兼用或混合也主要发生在两广、湘南、湘西、川东; ④杂类中的 D1(好杆)、D3(花签)集中分布在川东, 两者因相邻而有了 D2(好杆~花签), 即“好杆”和“花签”形成了两个部分重叠的连续分布区, 至于 D4、D5、D6, 都是孤点分布。

四类词形在各方言里的出现频率如表 3 所示。

表 3 各类词形的方言分布

	官话	湘语	赣语	吴语	粤语	客家话	闽语	土话
A	350	42	85	86	44	49	1	16
B	4	2	4	49	21	19	100	5
C	3	3		1	32	5		1
D	7						1	

其中官话含晋语(41)在内, 湘语含乡话(4)在内, 吴语含徽语(15)在内, 粤语含平话(37)在内, 客家话含畲话(2)、儋州话(1)在内。

从表 3 可见: ①官话、湘语、赣语几乎只用“筷”类词形, 闽语几乎只用“箸”类词形, 吴语、粤语、客家话和归属有待研究的土话则介于中间, 部分方言使用“筷”类词形, 部分方言使用“箸”类词形, 前者更占优势。②词形兼用或混合最严重的是粤语。③D 类词形只见于官话和闽语, 所占比例都非常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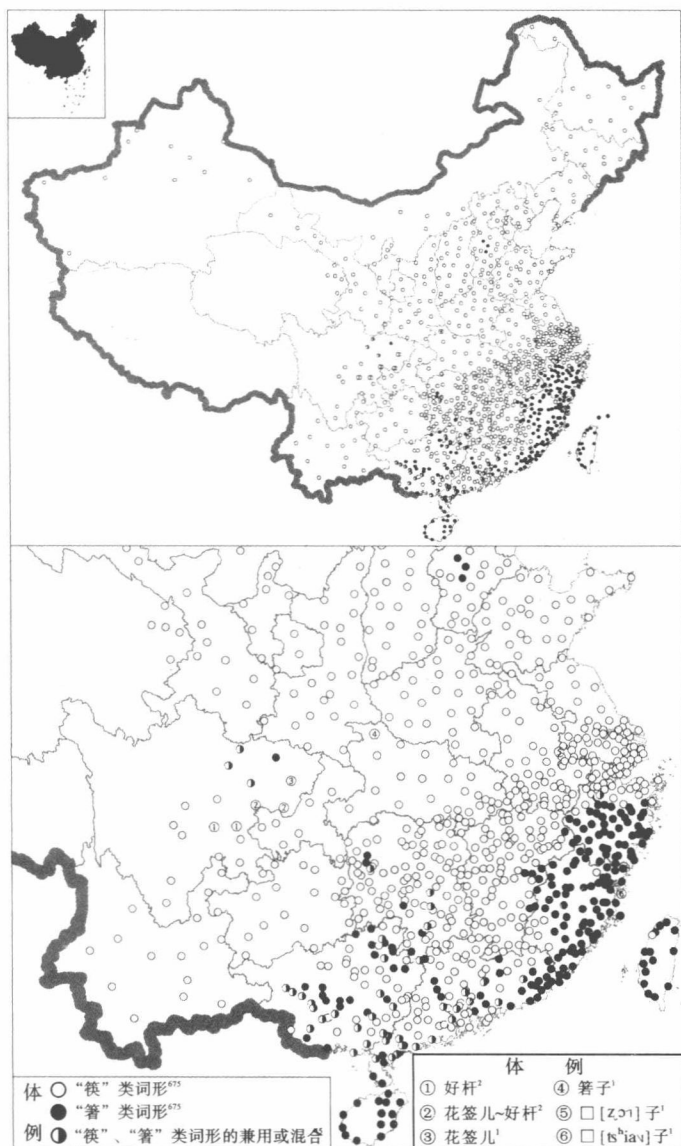


图1 汉语方言筷子的解释性地图

五 筷子的称谓简史

(一) “箸”

从先秦至清初，筷子一直通称为“箸”。战国《韩非子》卷七《喻老第二十一》：“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据四库全书荟要本）此事亦见西汉《淮南鸿烈·缪称训》（据四库全书荟要本《淮南鸿烈解》，下同）：“纣为象箸而箕子叽，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见所始则知所终。”西汉司马迁《史记》（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亦载此事：“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又见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纣始为象箸。”东汉王充《论衡》卷第六《龙虚篇》、卷第二十六《实知篇》（四部丛刊景通津草堂本）以及南北朝范曄《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也都提到了象箸之事。

象箸大概就是后代所说的牙箸、牙筷。不过唐代的司马贞看法不同。《史记》卷十四索隐：“邹氏及刘氏箸皆音直虑反，即筯也。今按：箕子云‘为象箸必为玉杯’，则箸者，是樽也。音治略反。”卷三十八索隐更进一步说明了理由：“箸音持略反。按：下文云‘为象箸必为玉杯’，杯箸事相近。《周礼》六樽有牺、象、箸、壶、泰、山。箸尊者，箸地无足是也。刘氏音直虑反，则杯箸亦食用之物，并通为器。”《周礼》（四部丛刊明翻宋岳氏本）卷五《春官宗伯第三》：“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宾客。”东汉郑玄注：“六尊：献尊、象尊、壶尊、著尊、大尊、山尊。”又同卷：“其朝献用两著尊。”郑玄注：“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尊，箸地无足。”根据《周礼》卷二《天官冢宰下》“酒正”的介绍可知，六尊乃盛酒器，因此司马贞的看法是不合理的。其实《韩非子》卷七《喻老第二十一》已经把“纣为象箸而箕子怖”的原因说得非常清楚：

（箕子）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鍤，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故曰“见小曰明”。

可见文意的重点在于因小见大，箕子从纣王的微小奢华看到了他最后的必然覆灭。所以“象箸”自然不是“象尊”和“箸尊”，也不会是饰象之箸尊（假使有这种东西）或象制之箸尊，因为尊乃必备之器，而象制之箸尊恐怕也有违事理。“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大意是用了象箸、玉杯，就一定不会拿它来吃豆类叶子熬煮的浓汤，而是要拿它来吃牦牛、大象、豹子的胚胎（熬煮的浓汤），总之是奢华会不断升级。也就是说，从文本分析的角度看，“象箸”就是牙箸，与“玉杯”正好呼应，都是奢华的开端。箕子由一双象牙筷子看到了必将到来的大祸，所以说是“见小曰明”（语出老子《道德经》五十二章）。司马贞不敢断然否定邹、刘之说，或可说明他对自己的观点其实也并无太大的把握。

殷纣王是商朝最后一位君主，生活在公元前11世纪，“为象箸”一事说明箸的发明和使用还要更早，足见中国使用箸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我国最早的古箸是1934—1935年在安阳殷墟出土的铜箸（侯家庄西北冈1005号祭祀坑，三双），本“装有木柄”（梁思永1937/1959），箸长26cm，粗细为1.1~

1.3cm（史语所展品图录制作小组 2002，51），陈梦家（1954，25）认为大概是烹调用具，此说甚是。这种又粗又长的大箸正是烹调和处理菜肴时用得上的。

1988—1989 年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出土了近万件先商、商、周等时期的遗物。遗址堆积共分 7 层，第 3 层出土的东周时期遗物包含了牙箸，第 5 层出土的商代中晚期遗物包含了骨箸，两者的纹饰非常接近，但骨箸仅存首部，牙箸的足部亦有残缺，如图 2 左、中所示（参看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 1995，图亦引自该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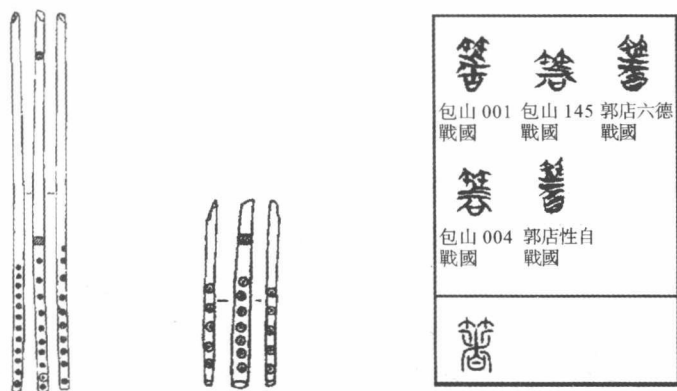


图 2 东周时期的牙箸（左）、商代中晚期的骨箸（中）和古文字里的“箸”（右）

此外，1964 年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出土的战国早中期文物亦含铜箸 2 支（云南省文物工作队 1964；李晓岑、韩汝玢 2010），1977 年安徽贵池发现的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的铜器亦含铜箸 2 支（安徽省博物馆 1980）。

根据高明、涂白奎（2014，1056），“箸”字在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和金文里都阙如，战国竹简则有之（如图 2 右上栏所示，下栏为《说文》所录篆书）。先秦记录餐具箸的用字有哪些以及“箸”字的造字本意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不作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初期的箸在使用上是有限制的。西汉戴圣根据秦汉以前的礼仪著作辑录编纂而成的《礼记》留下了这方面的记载。《礼记·曲礼上》（据十三经注疏阮刻本）：“饭黍毋以箸。”《礼记·曲礼上》“共饭不泽手”郑玄注：“礼，饭以手。”孔颖达疏：“古之礼，饭不用箸，但用手。”也就是说，以手抓饭是先秦的礼俗，至于箸，则是用来夹食羹中的菜或肉的（参看下文 5.2）。

有的学者认为先秦以匕食饭（例如王仁湘 1997/2006，51；贤之 2006，209），主要根据是《礼记·曲礼上》“饭黍毋以箸”的孔颖达疏：“饭黍毋以箸者，饭黍无用箸当用匕。故《少牢》云：‘廩人溉匕与敦。’注云：匕，所以匕黍稷是也。”这种看法本文不取。郑玄的注已经说得很清楚，匕是用来“匕黍稷”的。清江永《礼记